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再审视： 基于2012年台湾地区TCS数据的实证分析

游淳惠 徐煜

摘要

基于台湾地区传播调查资料库2012年所收集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间的关系置于台湾地区社会的语境下进行审视。结果发现,当控制了人口统计学、政治心理特征和其它传统媒体媒介使用的影响之后,互联网的政治新闻使用并没有对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见表达产生显著影响,但它却与台湾地区民众的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呈显著的负向关联性。网络政治新闻使用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对这两类政治参与行为还具有交互效应: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对参与竞选活动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大;而随着内部效能感越高,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对投票意愿的负向影响反而越小。

关键词

媒介效果、政治变革、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

作者简介

游淳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soar.doris@gmail.com.

徐煜,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xuyufudan@gmail.com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12 TCS Data

YOU Chunhui, XU Yu

Abstract

Based on 2012 TCS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society. Results show that online political news use is not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individual-level political opinion expression when the factors of demographic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antecedents, and traditional media use are controlled. Online political news us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ampaign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in the study.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s found to interact with online political news use to shape these two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 effects sugges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political news use and campaign participation is more negative among people with higher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political news use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is less negative among this group of people.

Keywords

media effects, political change,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efficacy

Author

You ChunHui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soar.doris@gmail.com

Xu Yu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mail:xuyufudan@gmail.com

台湾地区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它对政治生活产生的潜在影响引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近年来,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支持“媒介妨碍论”(media malaise thesis)与“媒介效果促进论”(media advancement thesis)的学者各执一词,但都认同一点:媒介技术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Garrett,2006)。本研究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置于台湾地区地区的社会语境进行重新审视。基于对2012年台湾地区传播调查资料库(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简称TCS)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尝试以网络政治新闻的关注度为主要切入点,考察互联网使用和与线下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一)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与政治民主化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它通常被定义为社会成员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Verba, Schlozman & Brady,1995:38)。政治参与只关注与政治事务有关的实际行为,政治态度则与政治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陈振明,李东云,2008)。

学术界对政治参与有“单一论”和“多元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早期的政治科学研究者普遍支持“外延缩小论”,他们认为政治参与仅意味着在政治选举中投票;当代研究者更为认同“外延扩大论”,即认为表达个人政治观点、参与竞

选活动等均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李亚好,2011)。

鉴于学术界对是否能将互联网中的政治行动视为政治参与存有疑问(Boulianne,2009),本研究仅关注传统的线下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参与的概念化界定,我们遵循的是多元论者所认同的“外延扩大论”。

(二) 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政治参与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同视角的研究者提出了“媒介妨碍论”(media malaise thesis)和“媒介效果促进论”(media advancement thesis)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使用阻碍人们参与政治行动的意愿。例如,Putnam(2000)认为,由于人们主要利用互联网从事娱乐活动,因而将花费更少的时间关注公共议题,这将有可能使他们转变为政治冷漠者。乐观主义者则坚信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理应该是积极的,新技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激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治行动中去(Jennings & Zeitner,2003; Rheingold,2000: 1-24)。

支持“媒介效果促进论”的研究者又可以分为两个子派别,即“工具论模型”(instrumental model)和“心理学模型”(psychological model),并分别为各自的主张提供了理论解释的框架(Bimber,2003:197-228)。“工具论模型”强调互联网在降低获取传播政治信息成本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的流通数量、多样性及其传播速度,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弥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资源、技能和政治知识层面上的差异。“工具论模型”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将吸引来源更广泛的行动者来参与政治行动,这就包括了那些原本在政治方面并不十分活跃的个体(Carpini,2000)。相比之下,“心理学模型”并不认为互联网具有社会补偿功能,它强调互联网的影响仅作用于那些原本就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的行动者。持“心理学模型”观点的学者认为,新技术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将取决于个体原有的心理特征,那些对政治事务表现得更为积极的行动者将从互联网使用中受益更多(Drew & Weaver,2006; Xenos & Moy,2007)。

虽然不同的经验研究在样本选择、抽样方式以及对互联网使用的操作化定义上各有差别,但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与“媒介效果促进论”的预测相吻合。Boulianne(2009)对发表在英文顶级刊物中的相关定量研究结果做了统计,研究发现,在这些研究所涉及的166项互联网使用效果中,除去13项没有效果方向的结果以外,有127项结果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积极影响,这其中有74项的回归系数为显著的正值。剩余的26项结果与悲观主义者的论点一致,仅有6项的负向回归系

数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支持“媒介妨碍论”的研究因而只能给出“有限效果”的经验证据。

尽管“媒介效果促进论”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支持,但我们不能将此结论简单地推论到台湾地区等具体社会场景当中,这是因为媒介技术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必要被置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系统中加以检视(Garrett,2006)。Boulianne (2009)的元分析(meta-analysis)所囊括的研究均以美国、加拿大等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民众作为研究对象,就本研究中所考察的台湾地区社会而言,尽管台湾地区也实行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它的民主化转型恰恰是建立在国民党近四十年威权统治的基础上。从陈水扁腐败案等事件也可以看出,反民主的力量仍然活跃于台湾地区的政治版图中。因此,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具有双重属性:它既包含了自由民主制的元素,也保留了威权制时代所留下的印迹(Wang,2008:1-44; Zhang,2012)。在这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互联网使用也可能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

已有台湾地区本土的实证研究也给出了相互冲突的经验证据。陈忆宁和罗文辉(2006)的研究发现,网络政治新闻的使用对政治意见的表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使用互联网浏览政治新闻的频率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也为正值,但它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以上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媒介效果促进论”的观点。与之相对,张卿卿的研究则为“媒介妨碍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她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变量的影响之后,除工作与学业需求之外的上网时间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积极政治参与和消极政治参与的程度(张卿卿,2006)。她的另一项研究(Chang,2007)则进一步验证,台湾地区民众的互联网娱乐使用程度越高,他们介入积极参与和竞选参与的程度就会越低。

既有研究认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如果将政治心理变量和互联网使用同时放入预测模型中,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政治参与水平的独立影响极易变得不显著(Boulianne,2009)。比如,Drew和Weaver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控制了政治兴趣的影响之后,网络政治新闻的关注程度对美国民众参与2004年总统选举投票的可能性并不造成影响(Drew & Weaver,2006)。对此结果的一个合理解释是,政治心理变量是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变量。

然而,中介效应假说本身的缺陷在于它仅关注了互联网使用的“同一效果”而忽略了“差异效果”,即假设媒介效果在不同人群之间是均衡分布的(周葆华,2012)。就此,部分政治传播的研究者认为,新技术的使用效果在具有不同政治

心理特征的人群间是存在分布差异的(Xenos & Moy,2007)。只有当作为刺激源的信息流与受众自身的心理特征产生“共鸣”(resonance)时,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Bimber,2003:197-228)。传播学研究对“差异效果”的讨论主要体现在对“交互”(interaction)概念的重视(周葆华,2012)。Xenos和Moy(2007)检验了美国选民的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政治兴趣越高,浏览网上竞选信息对选举参与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大。张玮玉(Zhang,2012)对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二手分析,结果发现,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新闻使用与威权主义价值观所构成的交互项可显著地正向影响台湾地区民众的接触参与,但它无法显著预测其竞选参与的程度。总体而言,尽管不少研究已开始对互联网使用的“差异效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仍对其它政治心理变量与互联网使用所可能起到的交互作用还知之甚少。

二、研究问题

现有文献在测量媒体使用时,通常区分出“信息使用”(informational use)与“娱乐使用”(entertainment use)这两个维度。相关研究发现,越是以获取信息为主要动机的互联网使用者,其线下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就越高,而休闲娱乐型互联网使用不具有这种效果(Shad, Cho, Everland & Kwak,2005; Wei,2012)。但是互联网中的信息内涵过于宽泛,它与政治议题也并非一定关联,部分学者认为在研究设计中应把信息使用进一步细化为政治类新闻使用(Nah, Veenstra & Shah,2006; Shah, et al.,2007)。遵循这种思路,本研究在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台湾地区民众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公共事务紧密相关的网络政治新闻使用。基于以上的文献探讨,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当控制“个体政治心理特征”这一变量的影响以后,网络政治新闻的使用程度是否还能对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若这种影响存在,它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研究问题2:网络政治新闻的使用与政治心理特征是否对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具有交互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台湾地区传播调查资料库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第一期第一次调查数据。该调查以台湾地区地区年满十八岁及以上的台湾地区民众为研究总体,并以台湾地区地区户籍资料文件为抽样框,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法 (PPS) 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执行时间是2012年7月至9月,面访员邀请受访者在装有CAPI软件的平板电脑上填答问卷,最终共完成有效问卷2000份(张卿卿,郑宇庭,陶振超,杜素豪,2013)。

(二) 变量的测量

1. 政治参与

本研究选取了TCS调查中涉及的9道题目来测量政治参与。这些题目都是在Brady(Brady,1999:737-801)设计量表的基础上改编而得。受访者被要求在五级李克特量表中进行填答(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后,我们将得出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政治意见表达”、“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这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8.28%。

有5个题项在“政治意见表达”维度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它们包括“您会愿意叩应(call in)广播或电视上的政论性节目,来表达您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您会愿意参加示威游行”、“您会愿意参与电视媒体的电话投票,来表达您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您会愿意投书报纸或杂志来表达您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您会愿意向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反映您对议题的意见”(Cronbach's α 为.887)。

“竞选活动参与”包括三个题项,分别是“您会愿意参与竞选造势活动”、“您会愿意帮您支持的候选人拉票”、“您会愿意说服朋友支持您喜欢的候选人”(Cronbach's α 为.754)。“投票意愿”维度的测量题目为“公职选举的时候,您会愿意去投票”。

有必要指出的是,现有文献通常将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划分成两个维度。例如,张卿卿(Chang,2007)区分出“积极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和“竞选参与”(campaign participation)这两种类型。而张玮玉(Zhang,2012)将因子分析后得出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接触参与”(contact participation)和“竞选参与”(campaign participation)。其中,“接触参与”所包含的测量题目大致与张卿卿的“积极参与”子题项一致。本研究的“政治意见表达”因子和“竞选活动参与”因子分别与现有文献的“积极参与(接触参与)”和“竞选参与”相对应。如何理解本研究中台湾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第三个维度即“投票”维度,与已有研究的差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人的研究往往并不在量表中设置与投票意愿相关的问

项。此外，本研究对“竞选活动参与”与“投票意愿”的维度划分也具有理论依据。Conway(2000:3)就认为，会投票与会拉票的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上具有较大差别，前者的参与行为积极性要更强。

2. 政治类新闻使用

本研究区分了三类政治类新闻使用，分别是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中政治类新闻的使用程度。与这三个维度对应的测量题目为：“您看到电视上出现政治新闻报导时，注不注意？”（ $M = 2.96$ ， $SD = 1.11$ ）、“您阅读到报纸报导政治新闻时，注不注意？”（ $M = 2.43$ ， $SD = 1.46$ ）和“您阅读到网络报导政治新闻时，注不注意？”（ $M = 2.03$ ， $SD = 1.53$ ）（1代表非常不注意，5代表非常注意）。这三个变量两两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0.18到0.44之间，属于低度相关的水平。

3. 内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兴趣

本研究考察的政治心理变量是政治兴趣和内部政治效能感。从概念上来讲，政治兴趣代表了个人对政治事务的喜好程度，而内部政治效能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理解政治事务和影响政治过程能力的信念。TCS调查同样选用了五级李克特量表来测量这两个变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政治兴趣的测量题项为“请问您同不同意，一般来说，您对政治很感兴趣”（ $M = 3.31$ ， $SD = .90$ ）。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题项为“请问您同不同意，政治虽然复杂，但您还是可以了解”（ $M = 2.62$ ， $SD = .96$ ）。

4. 控制变量

既有文献指出，政治参与会受到包括教育程度、收入等在内的人口统计学背景的影响(Milbrath & Goel,1977:86-122)。因此本研究将性别（男性占48.2%）、年龄（ $M = 42.77$ ， $SD = 15.65$ ）、教育程度（ $M = 3.42$ ， $SD = 1.03$ ，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和个人收入（ $M = 4.64$ ， $SD = 2.83$ ，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3）作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

表一：预测政治参与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N = 2000）

	模型1：政治 意见表达	模型2：竞选 活动参与	模型3：投票
第一层：控制变量			
性别（0 = 女性）	.116***	.107***	.049*
年龄	.103***	.170***	.177***

教育程度	.002	-.048	.038
个人收入	.026	.028	.038
增长的 R^2 (%)	2.7***	5.3***	3.3***
第二层: 主效应			
电视的政治新闻使用	.044	.138***	.112***
报纸的政治新闻使用	.013	.057*	.067*
网络的政治新闻使用	.042	-.053*	-.056*
政治兴趣	.506***	.359***	.010
内部政治效能感	-.004	.065**	.203***
增长的 R^2 (%)	26.7***	21.3***	8.0***
第三层: 交互效应			
电视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政治兴趣	-.020	-.011	.024
报纸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政治兴趣	-.032	.001	.024
网络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政治兴趣	.020	.033	.039
电视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内部政治效能感	-.013	.001	-.076**
报纸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内部政治效能感	-.011	-.042	-.049
网络的政治新闻使用 \times 内部政治效能感	-.045	-.059*	.075**
增长的 R^2 (%)	0.6*	0.7**	1.1***
调整后的总 R^2 (%)	29.4	26.8	11.7
注: a. 此表内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β 。 b. * $p < .05$, ** $p < .01$, *** $p < .001$ (双尾检验)。			

本研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最终结果来进行假设检验。在运用STATA建立模型前,我们将因变量(政治参与)的三个维度“政治意见表达”、“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进行了加总求均值的处理。另外,我们还将媒体使用变量及政治心理变量做了中心化的变化,两类变量所构成的交互项即为中心化赋值后的乘积(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81-87)。我们首先在第二层模型中估计了媒介使用和政治心理变量的主效应,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随后,我们还在第三层模型中检验了交互效应,回归模型的最终结果如表一所示。

第一,从主效应的检验结果可知,当控制了政治兴趣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以后,网络政治新闻的使用程度并不会对个人的政治意见表达产生独立的显著影响,但它却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竞选活动参与($\beta = -.053, p < .05$)和投票意愿($\beta = -.056, p < .05$),即个体对网络政治新闻的关注程度越高,他们参与各类竞选活动和投票的意愿也会相应越低。因此研究问题1得到了回答。

第二, 政治兴趣对政治意见表达 ($\beta = .506, p < .001$) 和竞选活动参与 ($\beta = .359, p < .001$) 的主效应均为显著的正值, 但它与各类媒介使用行为所构成的交互项对这两类政治参与行为不产生影响。政治兴趣并不是投票意愿的预测变量, 它对后者产生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都未能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

第三, 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主项可以显著正向影响竞选活动参与 ($\beta = .065, p < .01$) 和投票意愿 ($\beta = .203, p < .001$)。网络的政治新闻使用与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既可以负向预测竞选活动参与 ($\beta = -.059, p < .05$), 也能正向预测投票意愿 ($\beta = .075, p < .01$)。这也就意味着, 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 关注网络政治新闻对参与竞选活动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大, 而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对投票意愿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小。因此, 研究问题2也得以解答。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置于台湾地区社会的语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基于对2012年TCS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以网络政治新闻的关注度为切入点, 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和与三类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 它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会带来不同的政治后果。在考虑互联网所产生的影响时, 政治心理变量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忽视。由于2012年TCS数据质量可以得到保证,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张卿卿, 郑宇庭, 陶振超, 杜素豪, 2013)。

首先, 当网络政治新闻使用与政治兴趣、内部政治效能感一起被放入预测模型之后, 三类媒体的政治类新闻使用对政治意见表达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除性别、年龄之外, 影响个人政治意见表达的因素仅为政治兴趣的主项, 即政治兴趣越高, 政治意见表达就会越多。这一结果与一些台湾地区本土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例如, 陈忆宁和罗文辉(2006)的研究发现, 看报纸的政治新闻和看网络的政治新闻均会对政治意见表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 相关研究的一大缺陷是并没有控制政治心理因素的影响, 这将有可能导致回归模型估计的偏差, 因为遗漏变量会与自变量具有相关性。另外, 正如西方的既有文献所指出的那样, 当政治心理变量和媒体使用一同被放入模型中, 媒体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很可能是不显著的,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心理变量在其中充当了中介变量的作用, 即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没有直接影响, 只能通过政治心理变量对政治参与产生间接影响(Boulianne, 2009)。

为克服既有研究忽视政治心理因素影响的缺陷并验证中介效应假说的存在,本研究通过检验回归系数来判断政治兴趣是否充当了媒体使用与政治意见表达间的中介变量。我们分别设立了以下三个方程:(1) $Y = a_1X + e_1$; (2) $Y = a_2X + b_2M + e_2$; (3) $M = a_3X + e_3$ 。其中 X 代表互联网政治新闻使用, M 代表政治兴趣。判断方式为:如果三个方程中 a_1 、 b_2 和 a_3 显著但 a_2 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70-81)。表一的模型1已拟合了方程(2),其中 b_2 显著,三类媒体政治性新闻使用均不显著(即 a_2 不显著)。此外,我们还单独估计了方程(1)和方程(3)¹。方程(1)的结果显示,当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以后,电视政治类新闻使用($\beta = .204, p < .001$)与报纸政治类新闻使用($\beta = .084, p < .01$)对政治意见表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这两类媒介使用的 a_1 的系数为显著正值。与此同时,互联网政治新闻使用对政治意见表达的影响仍不显著($\beta = .047, p > .05$)(即 a_1 不显著)。方程(3)的结果显示,当只有控制变量存在时,电视政治类新闻使用($\beta = .318, p < .001$)和报纸政治类新闻使用($\beta = .141, p < .001$)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政治兴趣(即 a_3 系数显著),但互联网政治新闻使用则并不能影响政治影响($\beta = .011, p > .05$)(即 a_3 系数不显著)。由此可知,政治兴趣在电视政治类新闻使用与政治意见表达、报纸政治类新闻使用与政治意见表达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尽管电视和报纸的政治类新闻使用均不能对政治意见表达产生直接影响,但它们均能通过政治兴趣来间接影响到政治意见表达。而互联网政治新闻使用并不能直接或通过政治兴趣间接地影响政治意见表达。

其次,互联网的政治新闻使用可以对其它两类政治参与行为(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产生独立的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呼应了张卿卿(张卿卿,2006; Chang,2007)基于对2003年全台湾地区调查数据分析后的结论,但它却与大多数西方文献所支持的“媒介效果促进论”相冲突。本文认为,对该结果的解释可以围绕台湾地区的媒介生态格局及其独特的政治环境展开。伴随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浪潮,台湾地区也在上世纪80年代正式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并于1996年实行了首次地区领导人普选。自此之后,参与各类竞选活动以及选举投票成为台湾地区民众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话题也自然成为各类传播媒介争相报道的主题。罗文辉等人(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2003)曾发现,在涉及竞选报导的新闻可信度方面,电视新闻的可信度为最高,报纸新闻的可信度排第二,而网络新闻的可信度则远不如前两者。然而,即使是在可信度较高的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中,也大量充斥着与选举议题相关的负面新闻和虚假新闻,这一现状与

台湾地区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有着重要的联系(张卿卿,2002; Wang,2008:1-44)。尽管台湾地区采取了与西方先进民主政体类似的政治体制,但它仍然保留着威权制时代的影子,这可以体现在党派内部的“黑箱作业”和“密室协商”,以及政党和部分大众媒介之间高度的“政治平行性(political parallelism)”(Hallin & Mancini,2004:26-30)等方面。由此可以推论,民众越频繁地浏览可信用度更低的互联网政治新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状况相当污秽,从而降低其参与各类竞选活动和投票的意愿。

再次,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差异效果”。我们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效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心理特征的人群间是存在分布差异的,它取决于作为刺激源的信息流是否能与受众自身的心理特征产生“共鸣”(resonance)(Xenos & Moy,2007)。传播学研究对“差异效果”的关注主要通过分析交互效应来实现。本研究发现,政治兴趣与各类媒介使用所构成的交互项均无法显著预测台湾地区民众的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因此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兴趣并不会对该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交互作用。相比之下,内部政治效能感不仅对竞选活动参与和投票意愿具有正向的主效应,还产生有趣的交互效应: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关注网络政治新闻对参与竞选活动的负向影响也就越大;而随着内部效能感越高,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对投票意愿的负向影响反而越小。对此结果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参与竞选活动和参与选举投票是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只有程序化的选举投票才能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政治进程,竞选活动所发挥的影响是间接的。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的台湾地区民众往往认为自己理解政治的能力越强,他们也更可能清楚地意识到:第一,相比参与选前的各类竞选活动,参与选举投票对未来政治走向的发展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竞选造势活动往往具有比较强烈的“表演政治”的性质,而在短期内说服他人转变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来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也并不现实。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可以拉大互联网对竞选活动的负向影响(富者越富机制),而它又可以同时弥补互联网对选举投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补偿机制)。

本研究的缺陷及后续研究建议包括:第一,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不可避免地面临内生性的问题,这会造成因果推断力的有限性。所以,笔者建议今后研究采用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或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这也有助于传播学者厘清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是否互为因果?是内部政治效能感调节了互联网使用和

政治参与的关系,还是互联网使用调节了内部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另外,在互联网使用的测量上,未来的研究也有必要加入社交媒体使用的维度。

第二,在模型选择方面,考虑到互联网的普及程度通常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会有明显的差异,而台湾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水平也有可能受到“蓝”“绿”版图结构的影响,笔者建议后续的研究者选择使用更符合这类数据特征的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或稳健聚类回归(robust cluster regression)进行估计。

第三,本研究所使用的TCS2012调查数据在一些关键变量的测量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在测量政治效能感这一概念时,该调查仅测量了内部效能感,并没有将外部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这两个重要的维度包括在内。此外,一些反映台湾地区民众独有政治心理特征的概念也并未在问卷中得以体现(陈忆宁,罗文辉,2006; Zhang,2012)。另外,该调查仅使用一道题项来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兴趣,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得知测量的信度水平。后续利用一手数据的研究在问卷设计上需要避免同样的问题再度出现。

(责任编辑:徐智)

注释 [Notes]

1. 由于正文的篇幅有限,我们并没有在此呈现回归模型的具体结果。如读者需要,可与通讯作者联系并索取。

引用文献 [Reference]

陈忆宁,罗文辉(2006).媒介使用与政治资本.《新闻学研究》(台北),(88),83-134.

[Chen Yi-ning & Lo Ven-hwei (2006).Media use and political capit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88),83-134.]

陈振明,李东云(2008).“政治参与”概念辨析.《东南学术》,(4),104-110.

[Chen Zhenming & Li Dongyun (2008).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4),104-110.]

李亚舒(2011).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新闻大学》,(1),69-81.

[Li Yayu (2011).Internet use,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se study on citizens of coastal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Journalism Bimonthly*, (1),69-81.]

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2003).媒介依赖与媒介使用对选举新闻可信度的影响:五种媒介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台北),(74),19-44.

[Lo Ven-hwei, Lin Wen-chi, Niu Lung-Guang & Tsai Cho-fen (2003).Media reliance, media use, and election news credibilit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 (74),19-44.]

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Wen Zhonglin, Liu Hongyun & Hou Jietai (2012). *Analyses of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张卿卿(2002).竞选媒体使用对选民竞选议题知识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以两千年台湾总统大选为例.《选举研究》(台北),9(1),1-39.

[Chang Ching-ching (2002).The impacts of media use on voters' campaign issue knowledge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An Exploration of the 2000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Taipei)*,9(1),1-39.]

张卿卿(2006).网路的功与过:网路使用与政治参与及社会资产关系的探讨.《新闻学研究》(台北),86,45-90.

[Chang Ching-ching (200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86,45-90.]

张卿卿,郑宇庭,陶振超,杜素豪(2013).《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第一期第一次调查计划执行报告》.检索于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material/files/20130913_8_a973fd0645f750942a910f8d4e76013f.pdf.

[Chang Ching-ching, Cheng Yu-ting, Tao Chen-chao & Tu Su-hao (2013).*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2012, First sub-topic of first pha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material/files/20130913_8_a973fd0645f750942a910f8d4e76013f.pdf.]

周葆华(2012).从同一效果到差异效果:对新媒体与主观阶层认同关系的多层次分析.《新闻大学》,(6),54-62.

[Zhou Baohua (2012).From same effect to differentiated effec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media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Journalism Bimonthly*, (6),54-62.]

Bimber, B. (2003).*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lianne, S. (2009).Does Internet use affect engagement?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6 (2), 193-211.

Brady, H. (1999).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J. P. Robinson, P. R. Shayer & L. S. Wrightsman,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Carpini, MXD (2000).Gen.com: Youth,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4), 341-349.

Chang, C. (2007).Politically mobilizing vs. Demobilizing media: A mediation model.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4), 362-380.

Conway, M. M. (2000).*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ton: DC: CQ Press.

Drew, D. & Weaver, D. (2006).Voter learning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d the media matte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3 (4), 25-42.

Garrett, R. K. (2006).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 (2), 202-224.
- Hallin, D.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 & Zeitner, V. (2003). Internet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 (3), 311-334.
- Milbrath, L. W. & Goel, M. 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
- Nah, S., Veenstra, A. S. & Shah, D. V. (2006). The Internet and Anti-war activism: A case study of information, expression, and ac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 230-247.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had, D. V., Cho, J., Everland, W. P. & Kwak, N. (2005).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 Modeling Internet effects on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5), 531-565.
- Shah, D. V. et al. (2007). Campaign ads, online messaging, and participation: Extending the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4), 676-703.
- Verba, S., Schlozman, K. L. & Brady, H.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Z. (2008). *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 Wei, L. (2012). Number matters: The multimodality of Internet use as an indicator of digital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 (3), 303-318.
- Xenos, M. & Moy, P. (2007). Direct and differential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and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4), 704-718.
- Zhang, W. (2012).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news use,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s from Singapore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 (5), 474-492.